



嘉宾：龙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博导，北京城市实验室创建人与执行主任）
本刊记者：文爱平

龙瀛：收缩城市， 应多些顺势而为，少些逆势而上

记者：最近黑龙江鹤岗市因为低房价上了热搜，火遍全国。“收缩城市”也随之进入大众视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收缩城市其实学界早已有所研究，请问为什么会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呢？

龙瀛：早在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已提出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后来在“十九大”报告中，习主席又提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建设美丽中国。我国城市化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出现了局部收缩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方开始关注城市发展规律，关注收缩城市等一系列问题。

从外部看，持续老龄化、抢人大战、减量规划……这些年我国城镇化与城市区域空间发展绕不过的“关键词”都与收缩城市有关。武汉、成都、天津等城市以引进高校毕业生为主体，同时高规格引进国际顶尖专家及各行业杰出人才；郑州、沈阳、西安、呼和浩特等城市把引进学历型人才的门槛降至中专，并放宽对高级工等专业技能人才的引进。多数二线和三四线城市都对学历型人才完全敞开怀抱，实行“零门槛”落户、“先落户后就业”，家属随迁等。其中，多数城市对学历型人才进行大额补贴或买房打折、提供人才公寓等。“抢人大战”促使我国人口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区集聚。

今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这是官方文件中，首次提及“收缩型中小城市”的概念，这让收缩型城市的概念，从学术讨论的范畴上升到官方认可的层次。要求收缩型城市“瘦身强体”，是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城市不一定永葆青春，城市规划也不可能永远扩张，要接受局部收缩的现实。这也就意味着未来这些人口流失、产业衰退、城市空间不断闲置的城市有望成为另

一种常态。总体上，还应该把收缩作为一个中性词来看待，一些发达国家也存在局部收缩的现象，但不影响经济整体稳步发展的态势。

记者：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的规划文件提出，要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包括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等。城镇落户松绑，对收缩城市来说是喜是忧？

龙瀛：国家发改委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宣布要让超大、特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其实，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依然严格控制户籍，全国其他超大、特大城市均已掀起“给钱给房直接入户”的人才大战。五年前发改委发布的规划文件，提出取消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限制。在这基础之上，今年的规划文件又提出，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大城市要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这意味着一大批二三线城市，如哈尔滨、青岛、西安、洛阳、宁波等将大幅降低落户门槛。

新政策将使特大城市集聚人口的规模扩大，同时加剧小规模城镇的收缩。进一步放宽户籍对于个人的发展机会应该是有利的，不过当劳动力涌向超大特大城市时，10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和城镇可能会出现局部收缩。以前不限制时，小城市的人口就在往大城市跑，这一限制，将导致更多的人口外流。目前的收缩城市，基本上都属于三线或以下，甚至是八线城市。

根据媒体对部分一二线城市2018年人口数据的梳理，常住人口增加最快的十个城市分别是深圳、广州、西安、杭州、成都、重庆、郑州、佛山、长沙和宁波。按照默认的划分标准，这十个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一二线城市。在一二线城市高歌猛进

的同时，中国城市化另一条不为人注意到的线索，就是收缩型城市正在逐渐增加或程度增强。这些常住人口增长前列的城市，它们所虹吸的部分人口正是来源于中小城市。

记者：收缩城市是否有明确的定义标准、评价指标？除了考察人口有没有减少之外，收缩城市的界定标准，是否还需要引入社会、经济等层面的其他因素？

龙瀛：城市收缩是城市人口、社会经济发展遇到问题，失去增长动能的综合表现。尽管目前国际上对城市收缩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但是普遍认为人口减少是城市收缩的主要标志。

一般而言，常住人口连续一年以上持续流失且缺乏回流的的城市，均可被视为收缩型城市。这一过程，如果伴随着人均GDP减少、财政收入下滑、城市建成区面积缩小，那么收缩城市面临的问题则更加严重。

人口减少是城市收缩的第一识别特征。人口减少既包括人口的迁徙流出，也包括老龄化等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衰退是城市收缩的另一特征（但并不是每个收缩城市的经济都衰退），包括工业城市的产业和就业的流失、城市财税下降甚至破产、产业转型等。然而相比经济数据，人口数据更客观。城市空间衰败或品质下降，如设施废弃、房屋空置等，是收缩的空间表征。

局部收缩背景下的收缩城市多是先人口减少，经济再下滑，然后空间上开始破败。有时候经济上会有滞后效应。即人口在变少，但城市的GDP还在增长，同时用地依然在扩张。这是我国收缩城市当前阶段的一个悖论。

现在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用人口口径来看城市收缩与否，并不是从经济的角度。但在人口数据的使用上，我们不能用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一方面，现在没有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很多统计年鉴的数据是参照往年的路径上报上来的。另一方面，城市边界经常变动，一变就和历史数据不好做对比，造成城市研究的断代。我们团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相比2010年，全国650多个城市（行政城市）中，2014年就有一百多个城市的市辖区边界发生了变化：比如撤县并到市里面，变成区；撤了地级县，变成地级市。所以，尽管同样的名字，但是范围不一样，研究就无法追踪了。

具体而言，对我国2000-2010年收缩城市的研究，我们用的是乡镇街道办事处的人口，数据来源于“五普”（2000年）、“六普”（2010年），通过数据对比能看到乡镇和办事处尺度人口的变化。我们现在最希望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出来之后，再跟之前的研究做比较，从而更确切地从人口角度反映中国城市化的变化。

记者：与城市衰落等既有的常用概念相比，城市收缩是否仅是一种同义反复？

龙瀛：从城市生命周期的理论来讲，城市是从无到有，

慢慢地繁荣，到达顶峰，开始衰落，然后重生或者彻底衰落。其实一部分城市的衰落是必然的。

在国内，城市化的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的城市必须要发展，我们的人口必须要增长，城市收缩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可能是衰落的表征，至少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国际背景下，收缩是一个中性词，收缩只是人少了，并没有说这是个破败的、失落的城市，更没有说这是个腐朽的城市。研究收缩城市，就是认识、尊重并顺应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规划师要彻底扭转过去几十年只见增长不见局部收缩的片面认识。

衰落和收缩不是一个概念，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有的城市可能衰落了，但过几年又好了，个别有可能重新走向振兴。就像一个人的体重可能短期内下降了，但后来又反弹了。有反复。虽然这种情况不多。收缩不一定是坏事，有些收缩城市以后可能还是要增长，但是相当部分城市要有计划地收缩。

记者：随着互联网和遥感地理信息技术的进步，大范围高精度表征人类活动的时空大数据获取成为可能。随着POI兴趣点数据、夜间灯光数据等大数据手段的出现，能否为辅助收缩城市的识别提供新的证据？我国有多少个收缩城市？

龙瀛：在收缩城市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比较创新的地方，在于首先利用大数据对我国城市系统进行重新定义，从实体城市的角度，我们发现全国共有3000多个实体城市。

在识别收缩城市时，必须确定我国有多少个城市。在最开始的研究中，我们用的是行政城市的概念，就是市辖区的范围。按照行政视角，我国有650多个城市。根据这个城市定义，我们研究了2000-2010年的收缩城市。利用“五普”和“六普”的人口资料，识别了在2000-2010年之间人口密度发生下降的城市，中国650多个行政城市中，180个城市的人口是减少的态势。将近1/3国土面积的人口在变少。而从街道格局而言，900多个街道办事处人口都在变少。当时以街道为尺度，实在是没办法。180个收缩城市的研究已经过时，那是9年前和19年前的数据作对比，太老了。同时，那个研究也受制于行政边界的约束，识别的是整个市辖区的人口下降，但有可能市辖区人口下降了，是因为外围人口减少，而中心城人口还是增加的。此外，当时的研究发现，多数城市的人口流失比例相对轻微。

后来根据首经贸吴康团队汇总的数据，2007-2016年的十年间，我国663个建制市中（地级和县级市），总计80个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收缩，占比12.1%，其中地级市24个，县级市56个。这些城市都经历了连续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减少。

“城市”既有行政地域概念，同时也有实体地域概念，乃至功能地域概念。正如北大周一星教授的观点，就我国城市而言，行政范围和实体范围相差太大了。如首都北京，其

作为直辖市管辖的总面积约1.64万平方公里，但里面有一万平方公里（三分之二）是山地，西面是太行山，北面是燕山，所以，虽然行政上北京是一万六千多平方公里，但作为城市实体地域的北京建成区则主要在五环内，而功能性地域的首都圈还可包含不归北京管辖的廊坊和固安部分地界。一般来说，作为一个行政地域存在的城市往往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其空间范围远远大于实体地域“城市”的空间范围，因为其中还包括了代管的县域和乡村，而实体地域意义上的“城市”则更加接近于世界其他国家对城市的定义。因此，很多研究报道混淆了区域的人口变化与城市的人口变化，行政地域单元的总人口流失其实是区域的收缩而非城市收缩。用行政上的市来作为收缩城市，不一定靠谱，比如说北京的人口少了，可能是主城区人口多了，但延庆人少了非常多。最好是在匹配城市概念下再研究中国有多少收缩城市。所以在后续研究中，为了更精确地识别收缩城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用遥感数据、滴滴数据回答中国有多少个实体城市和功能性城市。比如我们用滴滴数据识别出通勤数据，看一个小城镇有多少劳动力到附近的城市；再比如，我们尝试回答县城属不属于城市？很多人回答不是，我觉得行政上县城不属于城市，但实体上它肯定是属于城市，它有自己的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政府大规模用地。运用这些数据，我们研究认为实体上中国有3000多个城市。

我们研究的实体城市，目前还没达到实践应用程度。当然我们也希望能给民政部建言献策。但这也很难，中国不可能设三千多个市长吧。

我们研究收缩城市的第二个创新，是用夜光影像的大数据一个来看每个实体城市近年来的变化。因为灯光代表一个城市的活力，收缩城市是用地和灯光两者增长不一致的地区，所以可以用夜景灯光来识别。目前我们正和百度地图慧眼合作，用它们多年的大数据来看中国这三千多个城市人口的变化和就业岗位的变化，重新识别全国的收缩城市。要想精细化地识别收缩城市，只有大数据有机会，传统数据不可能。

我和研究团队利用卫星影像检测3300个中国实体城市夜间灯光密度，发现在2013年至2016年间有938个城市在收缩，数量居世界之冠。用夜光数据来识别，夜光亮度少于10%或者以上，说明城市社会经济综合水平在下降。但用这种方式识别收缩城市也有问题，是夜光变化10%以上，人口就少吗？不一定，夜光亮度只是一个代理的变量，当然，我们也有研究证实夜光亮度和GDP、人口是90%以上耦合的关系。也有学者研究证明，亮度越高，这个地方GDP相应也越高、人口越多，或者说能源消费的数量越高等。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看一下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或者是全球的灯光亮度的变化是一个什么态势。在直接亮度对比之前，我们做了较为复杂的亮度矫正工作，以保证两个时期的夜光影像具有可比性。

之所以用全球的夜光来做，是因为能看到全球收缩城

市的态势和中国所处的位置。中国收缩城市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国是比较严重还是相对普通？为此，我们一共用夜光数据识别了全球16000多个实体城市，也就是自然城市，没有管纽约行政边界是什么，伦敦行政边界是什么，只利用规模以上的建设用地（比如超过五平方公里），以同样标准来定义城市。2000-2012年的全球夜光数据显示，全球有20%是收缩城市。在2000-2012年，收缩城市数量最多的是美国，第二是德国，然后是法国、英国，中国排第五，中国平均收缩比例是9%，美国达到28%。2013年换卫星了，之前是夜光1000米的精度，之后是约500米的精度。2013-2016年的全球夜光数据，结果让人很震惊，这阶段中国的收缩城市数量排第一了，之后是美国、德国、英国、巴西、日本、南非。对于这个结果，我们也进行了多次验证，结果收缩比例还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发现了已有的、传统的统计数据上没有反映出来的一些秘密？百度有2017-2019年的大数据。我们现在就是要和百度一起来重新识别一下收缩城市的数据。这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如果用百度大数据还能印证这个，说明问题就严重了。这是目前谁都没有发现的一个问题。

记者：收缩城市的主要标志是人口流失。请问人口流失是否一定是坏事？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纷纷提出人口“天花板”的控制规划，严控城市规模。疏散人口是否也会让这些城市逐渐失去活力？

龙瀛：人口的空间再配置，或者说人口的自然流动，本来就是一种世界普遍的现象。人口的集聚有助于实现各种经济要素的充分调用、提高其效率。以中国当前60%左右的城镇化率，如果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75%-80%的高城镇化率，则意味着这种部分省市人口的流失与城市收缩的现象必然会继续存在。

人口流失不一定是坏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人口流失、城市收缩之时，城市相应的产业政策、城市规划是否能够相应调整，以更切合自身情况的经济发展计划、发展模式与产业规划，适应新的形势。各城市政府应掌握本地区的人口流动情况，调整相应的规划及政策，改进城市的产业生产布局，调整相关管理职能。

对于收缩城市，人口流失也不一定是坏事。而且具体是好事还是坏事，还要看是针对谁。对于政府来说，为了城市发展，不一定是好事。但对老百姓来说，如两个老头老太在家，收不收缩无所谓，只要有基本的服务配套，医院照常开，超市照常有即可。对城市规划师来说是好事吗？也不好，规划更难做了，收费更难了。如何将空置的楼房、消失的村庄变成城市绿地或复耕为农业用地，为在地的城市人口或农村人口，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用地，将是收缩城市政府新的、重要的管理职能。

现在一些大城市都在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人，但是我

认为，中国真正有资格说这话的只有三四个大城市。人多是城市的后发优势。现在的河南省和四川省，原来都是人口大省，如今他们的中心城市体现了一定的后发优势。严控城市人口规模，不一定会让大城市失去活力，活力还在，但活力的增长就有限了，有点自断前途。我的意思是北京可以变得更好，但因为有了限制人口的政策，变得更好的速度可能放慢了，或者能不能变得更好也受到一些影响，这个政策只能拭目以待了。首先疏散人口政策能执行多久不可知，执行了能不能产生效果也不一定，可能政策稍放松一点人口就又进来了。

记者：目前我国收缩城市主要有哪些类型？

龙瀛：收缩城市从类别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收缩城市是资源枯竭型的，这种最接近“城市收缩”的本质概念。因资源而生，同样因资源枯竭而衰退。比如黑龙江的四大煤城，无一例外都属于收缩城市，人口在流失。

第二类是大都市周边的中小城市人口收缩。由于大城市虹吸效应的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便利的增加，周边城市人口不断向核心城市涌入。如北京周边的三河、高碑店，成都周边的都江堰等。

第三类是偏远城市的收缩。这些城市，既不靠近港口，也不靠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群，本身又缺乏资源支撑，在城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口最容易流出。比如甘肃定西、内蒙古呼伦贝尔、黑龙江齐齐哈尔、广西河池等城市。

第四类是工业转型的城市。比如东北的一些重工业城市，无法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不得不面临产业衰退和人口外流的双重危机。

第五类是人为的收缩城市。从行政视角来识别时，城市分分合合有时也会造成土地或者数字上的收缩城市，这种在我国并不少见。另外，一些政策会加速城市收缩，如去年各城市的抢人大战，这加速了很多城市人口的流失，而收缩城市连抢人的资格都没有。如像长江经济带、大湾区的一些鼓励政策，最终会促进大城市发展。

记者：不仅国内，国外城市收缩的现象也挺严重的，有的收缩城市，如匹兹堡走向了复兴，有的，如底特律走向了衰败，我们能否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让国内的收缩城市再次走向复兴呢？收缩城市将何去何从，城市政府该如何应对？

龙瀛：首先，能走向复兴的收缩城市是少数。我们研究收缩城市最重要的意义，是要让大家知道，要让政府认识到，收缩城市它自然的发展规律。未来是大城市的。虽然我说的比较极端，但这是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研究收缩城市，就是要告诉大家应该在应该折腾的地方折腾，不应该折腾的地方就不要折腾，这样可以避免浪费。

其次，我们要承认收缩城市的存在，然后顺应收缩城市的特点来发展。人口少了，我们有针对少的办法，而不是人

口少了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扭转。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对于收缩城市，我们要做的，第一是认识，第二是尊重，第三是顺应。规划不能违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城市有生命周期，增长、徘徊、收缩是三种发展形式，从城市群体和一个城市发展历史上看，三种形式都会存在，不同的城市、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地区城市化不同进程阶段，收缩表现不同，追求城市持续增长的理想很丰满，但城市发展收缩的现实却是骨感的，城市建设管理者、规划研究者要正视收缩。

收缩的城市，需要政府在人口流动与计划、规划之间做出转变，不能依旧假设城市与经济的增长是无限的。需要重视由人口规模及流动带来的各种经济发展模式变化、管理职能变化的问题。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商业配套措施、住宅开发、产业布局、经济增长点等，需要适时加以转变。要考虑废弃、空置的楼房、工厂等，该如何加以利用。而不是人口少了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扭转。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在更多的发展模式中，找到契合自身特点的方案。

记者：面对着“规模不增加了”的收缩城市，规划将如何适应？

龙瀛：首先要客观地制定收缩城市的规划。前面提到的180个收缩城市，我们曾通过公开渠道找到了其中63个城市的总规方案，无一例外地人口都是被预测增长的。2018年我们又把一些收缩城市的总体规划看了一遍，基本没什么变化，也就是规划为了增长而增长。这说明国内多数城市即便是收缩城市的规划人口都是增长的，甚至如果规划人口不增长，我们很多城市规划师都不擅长来编制规划。其实这并不是城市规划师的问题，比如城市规划专业的一些标准、技术规范等都是对应增长而非收缩的规划范式。所以几乎可以说目前的局面是收缩的城市，膨胀的规划。

城市规划是什么？是未来的安排。收缩城市不一定要做收缩规划。我们是给他们制定一个适应自然规律过程的规划。但规划并不都是为了增长，为了复兴的规划，有百分之七八十的规划都是要适应收缩过程，制定让剩下的人过的好的规划。这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规划不太一样。比如日本富山，人口少了很多，最后政府做法很简单，就是把人归归堆，中心城以外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受限，日常的服务就安排在中心城里面或者轨道交通场站和交通枢纽周边。其实，最终还是要保证收缩城市内剩下的人生活得正常有序。

在应对收缩城市的规划层面，要多些顺势而为，少些逆势而上。规划要留有时间和空间余地，增加弹性，科学合理地采取抵制或是接受收缩的措施，从观念上转变，勇敢地面对城市收缩这一问题。采取具体的规划和政策措施，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如果是接受城市收缩的规划，应充分利用人

口减少和土地利用的腾退提高城市居住质量。如果是复兴的规划，则应积极探讨新的城镇增长模式，如利用新兴产业和城市环境的改善来充分吸引人口。

我们也注意到了北京和上海公布的新总规针对人口规模的新动向。我们相信城市规划最终一定是要回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改善这个层面上来，而不是壮美的规划蓝图。

我国此前的城市收缩主要发生在资源枯竭型城市。未来，随着我国城市化从高速发展转入中低速发展，产能过剩、“走出去”，以及产业转移情况的日益发展，收缩城市的问题将更多地进入视野，值得深入研究以更好地应对。所以我们正在筹备一个收缩城市方面的工作坊——鹤岗收缩城市工作坊，计划招募100名左右规划设计的学生，让他们到收缩城市做半个月的调研，熟悉收缩城市，再做相应的规划设计的探索。我希望通过这个工作坊，用城市规划手段探索应对收缩城市的新路径和新方法。

记者：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新成立的鹤岗收缩城市工作坊吗？

龙瀛：鹤岗工作坊，全名是中国收缩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坊（2019）。它以大学院校为单位，以小组形式参加竞赛，每组3-5人。它的组建希望直面中国收缩城市的客观现实，通过城市规划与设计手段，拥抱新技术和新方法，探索应对收缩城市的可能途径，探讨在人口衰减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实现人口聚集、地区活力提升和城市环境改善，实现城市的精明收缩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坊是由鹤岗市人民政府、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协（学）会等主办，由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出资组建的。现在已有20多队报名，5月初报名的学生和指导老师先到鹤岗现状考察，进行场地分析，形成设计策略，并提交设计构想。然后参赛团队驻场工作，来做收缩城市的规划设计或提供政策建议。

鹤岗下一步走向如何，需要让大家来集思广益。工作坊只是搭建一个工作平台。本次工作坊选择鹤岗市作为设计对象是今年二三月份就选好了，鹤岗市后来四月份成为网红城市，二者没有因果关系。并不是说因为房价低，成了一夜爆红的网红城市，我们才选择它作为工作坊所在地。主要是因为它作为资源型城市，近年来伴随人口流失带来的城市中心萎缩、失业率上升、经济动力不足等问题愈发明显。鹤岗是东北收缩城市的缩影，其实黑龙江省总人口从2012年末的3811.0万人已减少至2017年末的3600.6万人（采用黑龙江省统计年鉴中的公安年报数据），6年间黑龙江省总人口衰减210.4万人。人口流失导致黑龙江省经济下行，东北老工业基地未来的发展研究迫在眉睫。

记者：中国收缩城市学术研讨会持续跟进收缩城市的研究上功不可没，自2016年首届会议举办，到今年已是第四届，相比之下，研讨会有了什么新的变化？

龙瀛：中国收缩城市学术研讨会最早是由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SCRNC）发起的。这个网络是中山大学李郁教授和我于2014年共同发起并创办，致力于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的学术研究网络。

自2015年起，我与团队成员一起，对东北地区的典型收缩城市伊春开展了四次调研，对其成因与表征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且还通过网络对规划从业人员与在校科研人员和学生进行了《中国收缩城市研究基本态势调查》问卷的发放，共获得了逾500份反馈，对中国收缩城市的认知与研究情况有了较为深入地了解。

为持续跟踪国内外收缩城市的研究进展，2016年5月“首届中国收缩城市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办，会议围绕收缩城市的识别、不同地区城镇收缩特征和城市收缩的规划应对等展开探讨，以期为大家认识我国收缩城市的客观现实、空间结构与形成机理，对未来的城市发展的研究启发新的突破点，探索应对收缩城市的路径和方法提供有益参考。

第二届研讨会2017年在湖南大学举行。我作了题为《收缩城市与空间衰败：以齐齐哈尔为例》的学术报告，并与会代表分享了我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近年来在收缩城市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新进展。

第三届研讨会于2018年11月3日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召开。会议进一步结合国际收缩城市理论前沿和国内城市发展环境以及空间规划的变革现实，就“城市收缩，中国城市化的另一面”这一主题继续开展相关议题的深入讨论。

第四届研讨会将于今年7月在哈尔滨的黑龙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召开。跟前几届相比，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参会的人越来越多，人员构成越来越多元化。参会的有高校学生和教师，有规划师，有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我们还邀请摄影师介绍镜头下的收缩城市。

其次，今年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将会让鹤岗收缩城市工作坊的获奖团队来做大会报告，介绍他们的方案。

最后，我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波澜壮阔城市化的背景下，收缩城市属于这一过程的局部，我的团队与国内其他同行一道，都希望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良好有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